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 学术讨论会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文学

张 炯

内容提要：本文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证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文学的密切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不但参与新文学的积极创建，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努力，使新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得以克服种种错误倾向，奠定了革命的方向，获得深刻的人民性和崇高的思想性，由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并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中不断获得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规律的把握也越来越深入，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也越来越全面和正确，从而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和新文学几十年取得的伟大成绩，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新文学。相信我国作家、艺术家必将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沿着党所指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宽广的道路上奋力前进，迎接文学繁荣的新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学都诞生于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即五四时期。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正都是“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主将和中坚。我国文学从文言向白话，从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变革，与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大力倡导和促进分不开。党成立后更十分重视对文学艺术的领导，广大党员作家、艺术家在不同时期都广泛参与新文学新艺术的创造。70年来，中国新文学经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它所遭遇的曲折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都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今天回顾历史，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对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深化文艺规律的理论认识，更好地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正是十分必要。

中国共产党导引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方向

新文学运动的参加者既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各有选择。始终坚持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并将之推进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正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坛不仅存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存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乃至汉奸卖国的文学。为了导引和奠定新文学的革命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作家，不能不与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学进行不懈的斗争。正是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上世纪末梁启超等维新家把文学与社会改革相联系的努力，将文学纳入本世纪中国伟大社会革命运动的轨道，从而使它获得超越于一般审美的崇高目标。

新文学运动肇始便流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和倾向。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便与这种妄图使文艺脱离政治、脱离社会改革的唯美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邓中夏于1923年便连续发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和《新诗人的棒喝》二文，对当时自谓高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新诗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他们的作品“即使行子写得如何整齐，辞藻选得如何华美，句调造得如何铿锵，结果是，以之遗毒社会则有余，造福社会则不足”。他主张文学应为革命作贡献，认为“唤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励他们的感情”，而对此，文学乃是“最有效用的工具”。他希望新诗人“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以“唤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恽代英也十分重视文学家与革命的紧密联系，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①这种真知灼见，在那时正十分可贵。

大革命浪潮的高涨，催化了20年代“革命文学”的提倡和论争。而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屠杀，又直接导致工农武装起义和苏区建立，也导致白区左翼文艺阵线的成立和3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坚韧战斗。即使蒋介石集团对胡也频、柔石等左联烈士的屠杀，也未能摧毁左翼作家的顽强生命力。相反，如鲁迅所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②而瞿秋白、鲁迅更在推动革命文学发展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并肩战斗的英勇旗手。左翼文艺阵线不仅顶住了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而且与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以及“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文学派别展开必要的斗争，从而捍卫了革命文学的方向。尽管当时白区、苏区两

支文化军队被隔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区紧密配合革命任务的群众文艺运动也如火如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前方和后方，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兴起蓬勃的抗战文艺运动，其主旨也正都是高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革命思想。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阐明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处于国内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当时不仅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革命需要，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抛弃旧的政治立场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投身革命，使革命文艺运动更加波澜壮阔。3年人民解放战争过程中，无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革命文艺队伍都空前壮大。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一支宏大的由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终于胜利会师。它标志中国新文学新艺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获得伟大的胜利；同时也标志中国新文学新艺术进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阶段。

应当承认，新文学与革命密切联系的历史过程曾部分存在忽视文艺特征与规律的现象，特别是曾不适当地急功近利地要求文艺创作都要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乃至要求文艺家“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演中心”，这不仅限制了文艺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开拓，还导致创作“概念化”，“公式化”。这种状况在建国前后的不同时期都曾存在过。“文化大革命”10年“四人帮”利用“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甚至推出“阴谋文艺”这样的怪胎。正是鉴于上述弊病并考虑到新的历史条件，考虑到现代文艺不同种类、体裁、题材的不同功能效应，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虽然文艺不能脱离政治。

自然，这并非说文艺不能或不应为政治、为革命服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作家、艺术家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社会经济利益的制约，也不可能没有自己一定的政治立场、观点和倾向，即使中立，一定情势下也总有利于这一方或彼一方，人们固不应排斥文艺创作中有非政治的题材与主题，如山水诗、花鸟画，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明文艺可以整体上脱离政治，实际上山水诗、花鸟画也不是都无政治倾向，而不是政治题材、主题的作品也非不可以为一定政治服务。一部作品如果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使之身心愉快，更好地去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不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吗？

中国新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定自己为革命服务的方向，这并非贬低或损害文学的品格，相反，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品格，赋予它超越于以往时代文学的更为崇高、更为有益于人民的功能效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涉及人类五分之一的历史命运，震动了全世界，影响极其深远。为这样的革命服务，正是文学的光荣！近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有些人重弹“为艺术而艺术”的老调，竭力攻击和贬斥革命文学，妄图把我国文学引向脱离政治、脱离革命、脱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这种叫嚷，不仅理论上谬误，实际上这样喊叫的人，他们创作的作品何曾脱离政治？像《河殒》这样的作品，其鼓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共产党使中国新文学成为真正人民的文学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却使广大人民群众丧失创造和欣赏文学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广泛可能。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理所当然要为改变此种不合理状况而斗争。

还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便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也说：“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到群众的讴歌”。20年代邓中夏、恽代英、秋士、沈泽民等共产党人更提出文要表现工农并为他们服务的问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文学与人民的联系被进一步明确。郭沫若便号召作家“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①蒋光慈也说：“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倘若某一个作家，不明了这一层，那他将陷入谬误的深窟，永远在迷茫的歧路上徘徊。”^②

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从文学更好地为人民、为工农大众服务，提出文学大众化问题，主张作家“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并“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外，还认为“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作品体裁也要以“容易为工农大众所接受为原则”。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都为鼓吹文学大众化写过文章。当然，在当时白区工作条件下，问题还难以真正解决。这种解决只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才真正可能。

在这篇划时代的文献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还认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而为保证文艺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不仅号召文艺家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斗争，还要求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人民这边来，与群众在思想、情感和立场上取得一致。他还要求文艺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向人民普及，从人民提高。在要求文艺作品的革命政治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尽可能统一时，他更强调“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两者的统一。可见，在解决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不仅从唯物史观出发，而且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理论观点，从此，文艺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便成为中国革命文艺坚定不移的方向。在不同时期，虽然我国文艺家由于主客观原因，也曾出现过不同程度地疏离人民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文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正是中国新文学的强大而优良的传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更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③

可见，中国新文学的深刻人民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努力密不可分。新文学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现代中国人民的广泛斗争，表现了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理想、意志和力

量，而且创造和发展了许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文学样式和语言。人民，包括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真正成了文艺的主人。他们不仅成为文艺作品描写的主角和文艺欣赏的主要读者与观众，他们中还成长起许多文艺家。可以说，这正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最有超越性的划时代的深刻变化。从《白毛女》、《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建国前的作品，人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而从建国后的《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红岩》、《创业史》等也同样感到这种变化。

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并非没有受到干扰。既有把这种联系狭隘化，将人民只归结为工农兵的左的观点，更有来自右的否定这种联系的观点。例如当年《新月》派理论家便硬说“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⑥近几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冲击下，有些论者重又指出“文学从来就是贵族的”这种论调，诬蔑文学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是所谓“民粹主义”。

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它不仅涉及革命文艺的本质特征，也涉及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旨在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人民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他们作为文艺的广泛欣赏者和创造者正属历史的必然。他们在历史创造过程中所表现的主动性、创造性，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情感，也当然有权利在文艺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因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作家、艺术家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也正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赋予中国新文学以崇高的思想性

文学不能没有思想。在诸多艺术中，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比之其他艺术具有把握世界的广泛涵摄性和深邃性。思想与理性的参与是必然的，因为语言就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文学创作过程中交互为用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都只有通过语言才得表达。事实上，文学艺术不但通过形象表达情感，也通过形象暗示思想。文艺作品不但提供审美认识，还提供各种思想倾向，包括政治、经济、法制、道德、哲学、美学等多方面的观点。某些反理性主义作家所提倡的所谓“无思想性”，其实正是一种思想性。所以问题始终不在文学有无思想性，而在有什么样的思想性。

中国文学在其悠久历史中曾深受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影响。本世纪以来，西方人本主义逐渐风行。“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获得传播，各种思潮中人本主义也影响日大。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当时胡适、周作人等许多作家的初期创作，无不体现这种张扬“个性解放、人格平等，精神自由”的人本主义，即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这种人道主义尽管仍有一定进步性，但马克思主义者毕竟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它的水平上去。因此，20年代关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和论争中，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便大声疾呼：“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因为“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代的制度下也是求不到的”。^⑦蒋光慈也认为“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所以他断言“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⑧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赋予中国新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以一种超越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学的新的思想高度。人们从茅盾的早期作品到《子夜》，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都可以看到这种超越。至于40年代《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作品问世，更标志新文学中崛起的人民群众的崭新精神风貌和作家对生活的马克思主义透视。解放区人民文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洋溢的从集体主义出发的革命乐观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在新中国文学中更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一起成为5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的基本思想主题。而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上述文学主题中最有光辉的思想力量。朱老忠、林道静、梁生宝、江姐、杨子荣、雷锋、焦裕禄、王铁人等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就是这种思想力量的突出代表。他们无疑体现着人类思想的新境界、新高峰。那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旧人道主义在这样的形象面前，都不可避免要黯然失色。

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非未受到传统人道主义的影响。圣西门、欧文、傅利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仍是传统人道主义者，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也批判了传统人道主义，指出只要存在剥削和压迫制度，资产阶级的人道主张便是虚伪的、带有欺骗性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解放首先归结为阶级的解放，而非仅仅对个别人的人道关怀。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⑧从集体主义出发的共产主义的实现，才真正可能导致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和平等、自由、博爱的实现。而标榜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则只能起着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成为掩盖阶级剥削与压迫的遮羞布和麻醉人民革命的迷幻剂。

西方资产阶级评论家一再攻击我国革命文学，竭力贬低它的成就，认为只不过都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品”。可是他们毕竟无法否定西方文学也在宣传一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正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近年我国有些人也跟着西方的调子起劲叫喊，否定和贬低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乃至斥之为“文学赝品”；有的人甚至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肆攻击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攻击大公无私，攻击雷锋精神，有些作家甚至在自己作品中重又宣扬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旧人道主义，包括存在主义和新人本主义这种改头换面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还有以反理性为名，实则拣起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以此去观照生活、表现生命意识、生命冲动，这岂非历史的倒退吗？

当然，回顾历史，我们也应看到在对待文学思想性问题上也曾存在忽视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即把文艺视为单纯的“宣传品”，不去追求完美的艺术形式，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此外，也还存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人道主义的偏颇，既忽视对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应有提倡，也忽视传统人道主义在反封建上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都应该引为教训。

中国共产党为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促进中国新文学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历程。这与党本身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对文艺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到日益深入和全面分不开。这过程，

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曾犯过这样那样的程度不同的失误，但从发展看，正是从对成绩与失误的不断总结中，才逐步形成一整套比较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铺平了宽广的道路。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左倾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中主要的错误。这既表现为对文艺的特征与规律作简单的片面的乃至庸俗的理解，也部分表现为对苏联经验的机械照搬。20年代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30年代左翼文艺阵线的不够团结和后来发生的“国际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40年代到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虽都不是没有历史原因与必要，其中也正不同程度地表现有某些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文艺领域左的错误到50年代下半期更越演越烈，“文化大革命”的10年更演变为推行一条极左的文艺路线，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严重的摧残和危害。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全面地纠正了上述左的错误，使文艺工作从“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严峻境况中得到复和繁荣。

但是，来之右的方面的干扰也不可忽视。特别是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冲击文艺界，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这种思潮的纵容并放弃对文艺的积极领导、宣扬“不介入，少介入”分不开。这同样也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包括文学事业带来损害。

毫无疑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文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明显失误，都负有重大的责任。应当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对文艺的领导，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也是善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诗人。他十分重视文艺事业在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思想结晶——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为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今仍然是我们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宝贵指南。周恩来、刘少奇都曾经捍卫和阐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在捍卫、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更作出杰出的贡献。他关于文艺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论述，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左倾错误、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都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提到了规律性认识的理论高度。

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源与流、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探索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关于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共识，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基本的核心。

历史事实表明，凡是我们党坚持上述正确的文艺方向和方针政策时，文艺事业便走向兴旺和繁荣，反之，文艺事业便走向凋零和衰蔽。

正确处理“源”与“流”的关系，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他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他认为对于“流”也不能忽视，“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是有文野

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他主张既要“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但决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否则就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因而他要求文艺家深入到生活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毛泽东又十分注意生活与艺术的区别，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意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⁹

可见，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既与一切机械反映论划清界线，又与鼓吹“自我表现”的唯心主义创作源泉论相对立，而且对墨守成规的“全盘复古”论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予以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实际上提出了后来更加明确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是毛泽东提出的，它不仅是繁荣文艺的方针，也是发展科学的方针。毛泽东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反对“双百方针”，以为推行这个方针就会导致是非不分，天下大乱，害怕马克思主义失去阵地。实际上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所以，实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¹⁰

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也反对“双百方针”，他们竭力阉割这个方针的战斗内容，将之歪曲为不问是非妍恶，听任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错误思想自由泛滥的方针。某些思想糊涂的人则把双百方针与批评的开展对立起来，以为一旦开展批评就是违背双百方针，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对双百方针产生严重的误解。毛泽东说得好：“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¹¹

新时期1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包括文学的各个门类与体裁、样式，都取得巨大的成绩、经历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和改善对于文艺的领导，坚决执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明的正确方向和方针政策的结果。

还在1940年，毛泽东在回顾新文化新学运动的成绩时曾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极大的发展。20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

(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的任何时代”。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经过新文学走过70年的漫长历程，更可以看到新文学在世界总格局中趋于更加完备的现代形态，可以说，世界各国现代文学所探索过的形式，我国文学也都基本探索了；而在思想内容方面，由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引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胜利，超越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的，具有崭新风貌的显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也已经成为巍然屹立的巨大历史存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艺术70年的巨变，与中国共产党正分不开。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努力，中国新文学才可能沿着坚定的革命方向，不断加强与人群的紧密联系，提高自己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宽广道路上，向新的高峰前进。因而，毫无疑问，我国作家、艺术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加繁荣和兴旺，他们必将更为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也更加信心百倍地沿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引的方向，高歌奋进！

① 《文艺与革命》，《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

② 《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70页。

③ 《革命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上册，第219页。

④ 《关于革命文学》，《当代中国文艺论集》1933年版。

⑤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⑥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上册，第410页。

⑦ 同③。

⑧ 同④。

⑨ 《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2～883页。

⑪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391页。

⑫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4页。